

华侨回国观光团与新中国的侨务外交探析

施雪琴,王刘波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利用地方(侨乡)档案,以新中国组织海外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活动为中心,考察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组织华侨回国观光团的动机、华侨回国观光团的组织程序、基本构成、活动情况以及外交影响,以此来探讨华侨华人在新中国外交中的角色以及新中国侨务外交政策的发端与特征。本文指出,华侨回国观光团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侨务外交战略指导下的重要实践,观光团成员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以及侨乡变化的宣传,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的认同与支持,对新中国争取侨心,凝聚侨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 华侨归国观光团; 侨务外交; 侨乡

中图分类号: D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5)03-0064-11

DOI:10.14073/j.cnki.nywtj.2015.03.008

一、新中国的侨务外交政策

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华侨华人问题成为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际局势的剧变,特别是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成立与华侨相关问题性质的变化,积极推动解决一些影响中国与建交的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侨党问题、与华侨所在地的革命关系问题以及“双重国籍问题”。^①1955年,中国与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

收稿日期: 2015-04-15

基金项目: 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NACT)2015年专项研究项目“比较视野下的中日-东盟人文交流研究”(NACT201502)

作者简介: 施雪琴,女,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王刘波,男,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第一联络部副部长王稼祥的主张,认为华侨问题应被视为“侨民问题”,而非“民族革命问题”,应停止“输出革命”。195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侨民工作方针的指示”,以解决侨党问题以及与兄弟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该指示称华侨为“侨民”,指出华侨工作要划清与当地革命的界限,申明中共将解散侨党,同时劝告国内各民主党派不要建立海外支部。该指示还首次提出了华侨工作的方针:团结、爱国(中国)、友好(与当地人民友好)。参看陈希《侨务与外交关系——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50-51页。

题条约》为解决印尼乃至东南亚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奠定了基础。中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订,是中国政府华侨政策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中国对华侨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逐步转向推动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期望华侨推动中国和平外交的政策上来。^①如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何香凝主任多次在国庆庆典上对海外华侨发表广播讲话,“望侨胞遵循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与侨居国人民的合作”,^[1]中国侨联副主席庄希泉在1956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所做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当前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外华侨工作必须服从我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使他们体会祖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精神,遵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每个侨胞都应该做祖国的和平使者,促进所在国的人民和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2]为这一时期侨务工作方向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从历史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侨务政策与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政策关系非常密切,相互融合,可谓“侨务外交”时期。“侨务外交”在新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工作中至少包含3重内容与意义。第一,处理侨务、保护华侨华人权益成为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极其重要的内容。第二,在当时冷战环境下,海外华侨成为大陆与台湾政府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②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反对台湾蒋介石政权,争取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好感、认同与支持,促进海外华侨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与拥护,最终促进祖国统一成为新中国“侨务外交”的重要战略目标。第三,通过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向居住国宣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塑造新中国正义、进步、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即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社会的美誉度、信任度与认同度,从而争取东南亚国家民众对新中国的好感、信任与支持。因此,这一时期新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格外强调华侨的角色与影响。首先,东南亚华侨华人既是新中国推行外交的重要媒介与渠道,也是中国外交的主要受众。其次,侨乡成为强化中国与海外华侨的纽带,欢迎并组织华侨回国返乡观光、宣传侨乡社会主义建设新貌、塑造侨乡新形象成为新中国争取海外华侨华人认同与支持的重要方式。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在极其复杂与艰难的环境中。除缅甸、印尼、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国家承认新中国外,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等国在西方的操纵下,或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同盟,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或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这样的外交困境下,争取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北京,并利用亲北京的华侨华人来促进新中国与海外沟通、向东南亚公众宣传新中国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外交战略。

海外华侨在新中国侨务外交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海外华侨是新中国侨务外交政策的主体。这种定位源于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华侨的身份认同以及新中国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对华侨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共识,1956年,刘少奇副主席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团结他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大会上也同样指出“在国外华侨中,也已经广泛地形成了并且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华侨素来具有爱国传统,祖国的独立和几年来的成就又更加鼓舞

^① 中国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对华侨的政策逐渐发生改变,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时任中侨委主任的何香凝女士在其1956年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希望华侨积极参加当地的经济建设,并希望华侨支持祖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增进中国与侨居国的友好”。1959年,中侨委提出“三好政策”,即“华侨自愿参加侨居国国籍,很好;华侨愿意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华侨愿意回国的,也好”,以此引导华侨在国籍问题上的选择。但有关档案显示,“三好”政策的核心思想明显地表现为有组织地推动华侨在当地国定居,并以妥善方式推动凡有条件而又自愿转籍的华侨分头进行申请。参见上官小红《归侨与侨乡社会:福建安溪归侨安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14年,第8-9页。

^② 这一时期,台湾蒋介石政权也在东南亚积极开展侨务宣传、外交工作,如组织华侨到台湾参加“国庆”庆典、“总统”茶会、组织华侨观光、华侨青年观摩团、组织海外文教团体与康乐团体赴台参加比赛等。据统计,1954年至1976年,东南亚华侨青年观摩团赴台人数共计7081人,其中以菲律宾(4285)、泰国(1133)人数最多,而与新中国建交的印尼(29)、缅甸(6)最少。1968年至1976年间,共有近千个东南亚文教康乐团体赴台访问与比赛,人数超过36000人。见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第567-576页。

他们发扬了这种传统”。^[3]中央侨务委员会对海外华侨的阶级构成及其对统一战线的意义有如下分析：“华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职工、农民、支教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等劳动人民。他们是属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也是国外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华侨中有百分之五到十的资产阶级，其中绝大多数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属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华侨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在国外的具体条件下，有着相当广泛的政治影响。他们中不少的人和侨居国官员有交往，对促进我国和侨居国的友好，起着有益的作用。”^[4]这种论断明确地表明了海外华侨在新中国统一战线与外交战略中的角色与地位。

另一方面，海外华侨不仅是中国外交的纽带与媒介，也是外交的受众。重视向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击台湾国民党政权对新中国的造谣诽谤、维护新中国的形象成为当时侨务外交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侨务宣传工作。中宣部、中侨委等相关部门先后多次发文要求有关部门重视对海外华侨、侨眷的宣传工作。如1954年中侨委第四次侨务扩大会议指出：“目前侨务宣传工作还是薄弱的一环，要求我们在华侨侨眷众多的地区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党的华侨政策，使广大归侨侨眷安于乡居，争取侨汇，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通过归侨侨眷进一步团结与争取海外华侨。”^[5]

二、华侨回国观光团概况

组织海外华侨华人归国观光，向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侨乡的巨大变化是新中国侨务工作，尤其是侨务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中国政府与东南亚进步华团组织的各类东南亚华侨华人回国观光团是华侨回国观光团的重点。归国观光活动不仅成为密切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机制，更是新中国打破西方舆论围剿，向东南亚华社开展宣传与外交的重要媒介。新中国成立后，为争取侨心，凝聚侨力，新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组织各种形式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国返乡参观活动，尤其是在“五一”劳动节与“十一”国庆节期间，组织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参观旅游，见证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侨乡的巨大变化。观光团成员主要由亲新中国的侨领、华社闻人、华文报纸主编以及其他渴望了解新中国的各界华侨华人构成，成员来自印尼、缅甸、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马来亚、泰国、南越以及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其中，印尼、缅甸华侨华人是归国观光团的主要成员。

海外华侨华人回国观光团一般分为受邀（公费）以及自费两种。公费团主要邀请建交国家侨社侨团亲北京的侨领、社会闻人、进步华校校长与进步华文报纸的主编与记者。^①中国驻当地使馆与进步侨团负责观光团成员的遴选与组织工作，并在观光团出发时组织欢送仪式，华社也在进步报刊纷纷登载广告表示祝贺与支持，图1为印尼侨社刊登在1952年《生活报》欢送吕俊诚等人回国观光的广告。^②但不管是公费还是自费，国内的相关部门都要出面欢迎并组织接待。在接待过程

^① 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政府对中国政府组织的华侨华人观光团也存在顾虑，甚至进行阻挠。如印尼政府起初不愿颁发回国华侨的来回准字，而且还只批准商人，禁止文化界人士前往新中国观光。后经印尼华裔国会议员萧玉灿先生的呼吁，印尼华侨才于1952年8月获得自由出入境的准字；另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文化界人士也于1954年获准回国观光。参看《限制居民出国回国自由违反印尼宪法规定 国会议员萧玉灿向政府质问》，《生活报》1952年5月6日；《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已获当局同意颁发来回准字 各地参加须速办手续》，《生活报》1952年8月25日；周南京《努山塔拉华裔纵横》，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第490页。

^② 吕俊诚（1909—1967），生于福建南安诗山镇，后赴南洋，曾在雅加达创办《朝报》宣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爱国侨领组织创办“椰城中华侨团总会”，先后担任副主席与主席，《生活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椰城华校的董事、董事长。参看《吕俊诚先生生平简介》，见印尼椰加达中华中学旅港校友会《华中国地：纪念印尼椰嘉达中华中学创办75周年专辑》，香港，2014年，第57页。

中,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接待工作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指示,贯彻“政治接待第一,物资接待第二”的原则,政治接待主要体现为要从政治上高度重视华侨回国观光的重大意义与影响,做好组织工作、接待工作与宣传工作,不仅相关省市领导接见重要侨领与观光团,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接见重要侨领与观光团成员。图2和图3为1956年10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回国观光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并合影留念。[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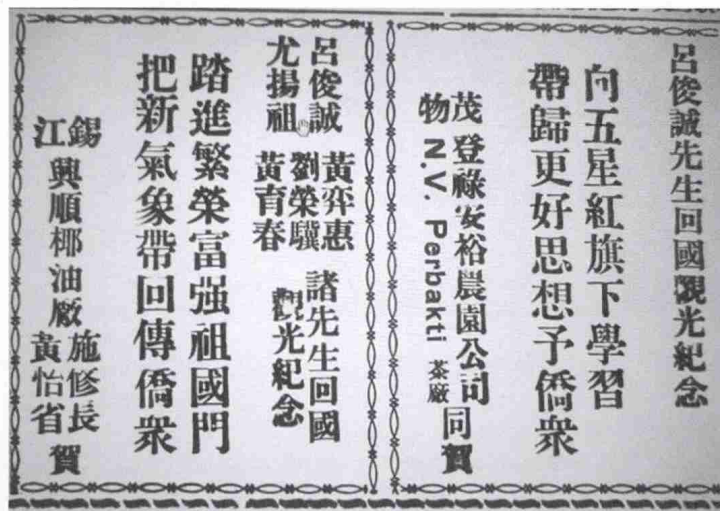


图1 欢送吕俊诚等人回国观光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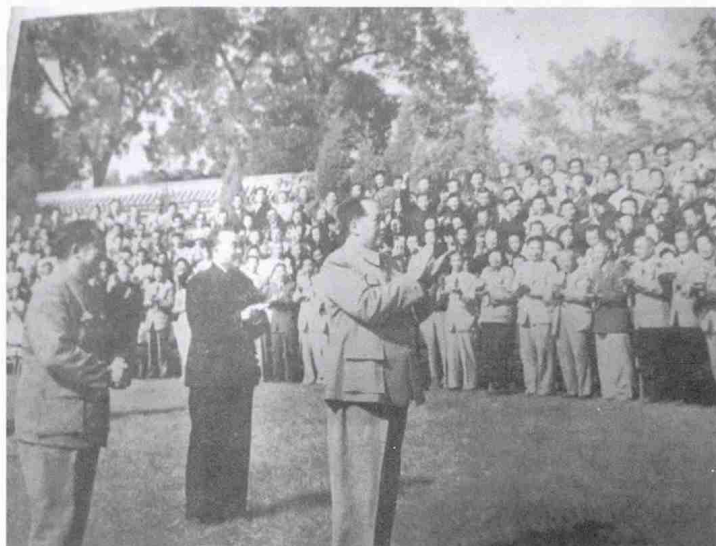


图2 国家领导人接见回国观光的华侨及港澳同胞



图3 国家领导人与回国观光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合影留念

此外,在物质接待方面,对物资接待标准做了严格的规定。^①接待工作强调“集中领导,统一安排,分工负责,加强协作”。在做好政治接待的同时,必须重视做好生活接待工作,各个有关部门要负责组织、协调华侨在国内各地的参观访问。回国观光路线一般是在各口岸入境,而后集体前往祖国各地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在集体参观完毕后,观光团成员纷纷回到原籍,了解侨乡变化。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不仅要做好接待工作,还要召开座谈会与宣讲会,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并记录华侨对各项政策实施的意见。广东、福建两省是接待华侨回国观光团的重要省份,对接待规格、程序都要严格规定。接待重要的观光团,相关部门的领导要参加欢迎仪式、组织安排在省会城市的参观活动,召开座谈会,主要介绍本省的工农业发展与侨务工作,并举行欢迎宴会。我们从1955年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观光过程可以略见接待工作的主要内容(见表1)。

此外,侨务工作报告是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的重要内容,希望通过侨务工作报告,使海外华侨认识到党和政府对侨务工作的重视,对华侨的关怀,了解侨乡的新气象,并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并吸收他们对地方侨务工作的意见。更重要的,组织观光团的目的,是希望观光团成员在返回侨居地后,能积极宣传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和平外交政策。如1954年,中国政府组织印尼、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南非洲等地的华侨回国观光团(134人)回国参观,就指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广泛宣传“第一,宣传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对巩固人民制度的极其伟大的意义,对今年侨务扩大会议所最后协商确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华侨代表表示支持和拥护,以扩大影响。第二,宣传我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和意志。台湾是我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战,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人民一定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集团。第三,宣传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取

^① 在公费接待标准方面有具体的规定,如1956年公费团的标准如下:公费部分:1、伙食费(包括管理费):北京、东北、天津、南京、无锡、杭州、福州、武汉、重庆、成都等地,每人每天不超过2元,上海、广州不超过2.5元;2、公什费:(1)文娱招待费: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沈阳每人每日1元,其余各地8角;(2)什费:临时疾病医药、公事邮电、行李运输装卸费,实报实销;3、住宿费:每房住2-3人,实报实销;4、车船费:火车按软席计算,轮船:一等/二等;5、宴会费:广州、北京、福州各举行一次;6、野餐费:每人每次1元(包括原伙食在内);7、礼品费:每人5元,统一由中央馈赠;8、返回时,从原籍省会开始至出国前到集中地时止,一切费用自理;9、返乡后的接待费用,经各地省市按具体情况规定,由地方华侨事务费内报销。参见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1956年国庆节华侨及港澳同胞回国观光团接待工作几点决定及1956年招待观光团开支标准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2-0717-0011。

得的伟大胜利和我国所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所起的重大作用。宣传我国人民和国外华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愿意增加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友好关系。第四,宣传五年来建设的伟大成就。”指示还强调“为达到这一目的,应有计划地组织观光团的深入教育工作。”^[7]

表1 1955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回国观光团部分活动^①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备注
8.4	雅加达	搭乘“芝利华”号,启程	
8.6	新加坡	拜访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李光前及其夫人陈爱礼女士	李春鸣曾担任该学校训育主任
8.12	香港	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欢送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采访团长李春鸣 ^②
8.12	深圳	广州华侨事务委员会及相关单位领导欢迎	入住深圳华侨服务社
8.13	广州	广东侨务部门领导及政协、民主党派人士欢迎	设晚宴招待观光团
8.13-8.17	广州	参观游览华侨麻纺厂、华侨补习学校、黄花岗72烈士墓	与相关领导会面
8.19-8.26	上海	参观绢纺织厂、卷烟厂、大中华橡胶厂、新中动力机厂、工人文化宫、少年宫、曹杨新村,参观幼儿园、学校,参加工商座谈会,会见董寅初 ^③	
8.27-8.31	南京	南京市相关领导车站迎接,介绍南京市概况、南京华侨学生情况,晋谒中山陵、雨花台烈士墓,游览历史名胜,参观中国最大化肥厂永利宁厂,参观南京博物馆,参加南京市文教座谈会,出席彭冲市长的招待宴会,观看越剧《花木兰》	

在华侨回国观光团中,相当一部分是自发的或者临时组织的观光团。如1956年福建省接待华侨回国观光团(包括港澳同胞观光团)23批共123人,10人一团的5批,5人以上的5批,5人以下及个别零星的达13批。他们来自东南亚各国,来自建国印尼的56人、缅甸14人、越南6人,来自未建交的马来亚13人,英国沙捞越和南越各1人,其他为港澳同胞与归侨侨眷。^[8]自费回国观光的华侨成分比较复杂,大部分是中下层华侨商人与普通华侨,其中中间分子居多。其回国观光目的也各异,来自建交国家的自费团大多是顺着返乡探亲,办理某些事务之便回来,他们对祖国比较熟悉,但还心存疑虑,对新政府有所怀疑,想通过观光来加以证实;来自未建交国的,多为中间落后人士,社会关系复杂,有伪人员,因此顾虑较大,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处处谨慎小心。^[9]成员政治面貌复杂,是自费观光团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1956年回国参加国庆节观礼的华侨(港澳)观光团与新、马考察团,共242人中,就包含特务1人,国民党员4人,与台蒋有联系的9人。^[10]值得指出的

① 1955年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共有成员72人,李春鸣担任团长,这是1950年来印尼历届华侨观光团人数最多的一次。观光团成员分别来自印尼8个地区45个城镇,这些华侨在侨社均有一定的威望,特别是在万隆会议期间为祖国赢得荣誉做出了贡献。成员中有工商界人士46人,文教界17人(多系各地中、小学校长、教员),妇女代表4人,青年代表3人,其他代表2人。参见郭乃华《李春鸣与1955年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见印尼椰加达中华中学旅港校友会《中华园地:纪念印尼椰嘉达中华中学创办75周年专辑》,香港2014年,第93页。

② 李春鸣(1894-1976)江苏南通人,印尼雅加达中华中学创始人之一,担任中华中学校长20多年,是著名的华侨教育家。从1918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从事华侨教育事业,担任印尼雅加达中华中学校长20余年,还曾担任雅加达中华侨团副主席、教师工会监事会主席、江浙工会监委,1966年回国定居,1976年病逝于重庆。

③ 董寅初(1915-2009),安徽合肥人,20世纪40年代初曾在印尼的华文报社任职,积极参加华侨文化界人士组织的印尼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雅加达被日军占领后,与李春鸣、张国基等雅加达中华中学教师组织队伍保护侨民与学生安全,后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1945年出狱后,担任印尼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1947年回国定居,在相关侨务部门担任要职。

是,一些自费观光团成员回国返乡观光的目的是为将来回国打听消息,准备退路,一旦侨居国情况恶化,就返回家乡。一些华侨回国观光则是希望在侨乡寻求商机,做生意,不少自费观光团的华侨商人甚至借观光之便违规携带大量商品沿路发售,这种情况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华侨回国观光团的组织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950-1955年以公费团为主,自费观光团较少。1956年开始,自费团开始增加,特别是来自非建交国家的华侨增加。这种变化,其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松动,特别是注重争取非建交国家的华侨以及滞留在港澳的侨眷回乡。国务院还专门出台了“做好1956年度华侨回国观光团员及港澳同胞观光团接待工作”通知,中侨委在1956年的工作规划中特别提到,为了进一步做好团结海外广大华侨的工作,及扩大对外影响,特别是对东南亚那些未与我建交的国家;同时也为了提高侨批业经营的积极性,争取更多的侨汇,和争取目前居住在港的1万多名本省侨眷回来。^[9]因此,1956年华侨回国观光团成员激增,超过1250人,尤其是在“五一”期间,就有351名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南越、高棉、老挝、日本、非洲、美洲、印尼、缅甸、越南、香港及澳门等地的华侨,各团来京参观后,即赴各地参观,然后返回广东、福建侨乡。由于这次参观团的大部分成员来自未建交国家/地区,与新中国接触少,对中国缺乏了解。加之中央政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邀请了一批过去对新中国有误解或者顾虑多的华侨上层人士回国参观。因此,在接待中,有关部门提出的方针是:爱国团结、求同存异,全面争取。要求在接待中要打破以往的公式化、生硬的一套,让观光团成员接触到他们所乐于接触的人和事物,让他们看到和听到祖国实际存在的好的和坏的、进步的和落后的东西,充分了解祖国在前进中的困难和美好的前景。^[10]

对于来自非建交的非洲地区的华侨回国观光团,相关部门也非常重视。1955年,接待了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的华侨商人回国观光团。南非马达加斯加系英属殖民地,新中国成立之初,该岛华侨约5千余人。马达加斯加华侨为自费回国观光团,冲破了许多阻力。该团约70人,由侨领陈福胜率领,名为旅行,实则途经香港,秘密回国观光和省亲。此批华侨离开马达加斯加后抵达香港,被香港伪中央社与逃亡地主及反动派诱骗与恐吓,并强迫他们去台湾观光,致使他们顾虑重重,不敢回国。后经委派专员前往香港,与香港中国银行人员共同进行争取说服,并组织家眷赴港会晤,始将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不为蒋方所诱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侨商30人,已于2月26日抵达广州,其他40人尚在香港观望中。为继续争取他们回国,中央有关部门一方面对已抵穗者加以热烈招待,另一方面继续组织其家属赴港与他们会晤。为团结争取马达加斯加的华侨,扩大新中国在非洲侨社的影响,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去各地参观,增强其爱国主义。^[11]

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积极组织与支持下,1956年后,回国观光的华侨迅速增加。据统计,1958-1961年共有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400多名回国观光华侨。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各地党政部门的重视,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各单位大力支持,互相配合,密切协作,认真贯彻执行了以政治接待为主的方针和热情接待的精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观光华侨对祖国的情况和三面红旗及侨务政策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提高了爱国热情,积极支援祖国和家乡的生产建设。他们回侨居地以后,积极宣传祖国,宣传侨务政策,扩大了团结爱国面,增进了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12]尤其是一些重点侨乡,华侨华人回国观光热情十分高涨,人数一年超过一年,据广东侨务委员会的统计,至1957年4月,回国观光省亲的粤籍华侨就有1万人以上。^[13]另据不完全统计,1954-1964年,仅广东新会县侨务部门就接待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回国观光团26批,共939人。^[14]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建国后第一次回国回乡。通过参观访问、座谈,不仅密切了华侨与祖国联系,而且也促进了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的了解,并通过他们将新中国的形象向海外传播,这对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沟通中国与东南亚社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华侨回国观光团的侨乡观感与对外宣传

华侨归国观光团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结束参观访问返回侨居地向海外华侨宣传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尤其是侨乡的巨大变化。事实上,通过回国观光访问,广大华侨对新中国的发展与家乡的变化都深有感触。以华侨在福建的参观访问为例,观光团成员参观福建侨乡后,在以下几方面感到满意:第一,肯定了福建侨乡的发展,特别是对几个大工程印象深刻,如鹰厦铁路、古田水电站、厦门海堤等。他们感到满意的是建设糖厂、兴修水利、文化教育和地方戏进步很快、抢救水灾及时、修葺开元寺等。特别是对物价稳定,社会治安风气好,烟赌嫖绝迹赞不绝口。如印尼观光团副团长张念遗说“我经常怀念家乡,但不敢回来,因当时治安坏,土匪多,政治腐败。现在新中国不同了,治安好,人民道德普遍提高,这全是毛主席的功劳,否则我没有机会回来。”^[15]第二,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带来的生产高潮和农村的发展前途有进一步的认识。第三,对国家给华侨、侨眷的照顾表示满意。第四,观光团活动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在南洋华侨中对新中国的造谣破坏,扩大了对外影响、在争取中间落后分子等工作上,也起到了一些作用,通过观光团成员的宣传以及政策解释,一些外逃分子也消除顾虑,回乡观光。^[16]第五,一些华侨回国观光后消除了回国投资居住的顾虑,激发了华侨回国投资家乡建设的热情。如港澳观光团与新马工商业贸易考察团在1956年回国观光参观后,积极支持家乡的建设,共投资250万元,捐献学校、医院和公益事业91万元。其中福清观光团投资107万元,还准备争取到350万元,自建一座糖厂。^[17]而印尼华侨刘波(双水人),1956年回国观光,亲眼看到了建国后的新气象。他回到印尼,立即动员其在印尼的亲友回国观光。新加坡华侨张日好(双水人),1957年任新加坡妇女回国观光团团长,回到家乡双水豪山乡,受到全体村民热烈欢迎。她很受感动,设宴100席与村民同叙,并投资10万元支援家乡建设。^[18]

但是,华侨观光团成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干部的官僚作风、侨乡陋习也有相当多的看法。首先,一些华侨担心社会主义改造对私人工商业的影响,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提到“苏联实现社会主义时,杀了很多资本家,中国将来走社会主义时不知亦要死多少资本家。”感到私营工商业没有前途,担心进入社会主义后私人资金及其前途问题。如粘XX说“如果我回国经营一个工厂,将来到社会主义社会,工厂收归国有,我是赞同的,但是这些工厂的资金是否归还给我,因为这些钱是我千辛万苦在海外赚来的,如果不还真是没有道理。”^[19]其次,对福建的粮食供应,婚姻纠纷及区/乡干部的作风等方面,颇有意见。对个别地区的土改遗留问题,出出国以及农业税收问题亦有意见。他们回乡后所要求处理的问题,主要是成分与房屋问题,其次是子弟升学和婚姻问题。侨乡基层的干部作风问题是华侨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认为乡村干部没按政策办事,对农民的态度不好,事做错了不承认。尤其对干部与侨眷通奸处理不严表示不满。观光团成员也对有些单位、党组织不愿发展归侨为党、团员所存在的保守思想,在评薪定级方面对归侨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归侨就业困难、归侨安置方面的不合理措施也提出了意见。^[20]此外,观光团成员对侨乡的卫生状况,交通不便,副食品供应不足,就业难以及毁坏侨乡的古迹、祠堂、坟墓等情况也表示不满。^[21]

在观光团的对外宣传政策上,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建议,指出要注意分寸,“历届观光团返回侨居地后,都以亲身体验的生动事例将祖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外的侨胞,使得国外侨胞能进一步认识和热爱祖国,从而扩大了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孤立了蒋介石集团。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介绍情况时只讲成绩,不敢讲缺点,对观光团的参观抓得太死,不敢放手,光怕他们看到缺点,这是不够实事求是的……”^[22]

应该注意的是,在接待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华侨回国观光团时,指出宣传政策要注意差异。如1955年5月接待应邀回国访问的越南华侨回国观光团,该团共25人,其中妇女2名。在组织越

南华侨参观北方大城市工厂时,有关部门明确指示要注意两点“通过参观,使他们认识到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前途,同时,向他们说明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是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也是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今祖国伟大的前途,也是越南人民将来的伟大前途。通过参观,加强对他们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祖国的今天是与苏联的大公无私和长期的帮助分不开的,而这种帮助是为着共同的经济繁荣。从而启发他们去认识今天我国对越南人民的帮助。要求越南华侨去学习苏联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越南人民建设他们的祖国。”^[23]另外,“针对越南华侨在思想上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工商业政策的不满情绪,希望将资产转回国内寻求出路的想法,以及华侨表现出的大国主义思想,强调要进行说服教育;要求侨胞以拥护祖国政府各项政策的精神,来拥护和遵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商业政策(包括其他各种政策),协助其发展和繁荣经济、稳定物价。使越南人民和华侨的生活安定。这样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利,对广大华侨和祖国也有利,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对越南华侨的侨汇争取也要掌握一定的分寸,既要照顾华侨汇款救济国内眷属的正当要求,又要照顾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困难,汇款数量不能过高,以免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建设。”^[24]

观光团结束参观访问后,积极在侨居地华社宣传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以及侨乡变化。尤其是在印尼与缅甸这两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亲北京的华文报成为观光团宣传新中国的重要平台。如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成员在印尼的《生活报》、《新报》、《大公商报》等撰文,发表大量对新中国的观感。尤其是印尼《生活报》,大量刊登侨乡以及祖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见表1)。^①

表1 《生活报》关于中国及侨乡的报道

年份	总报道数量	其他	揭露国民党、美帝阴谋	宣传祖国各地建设成就(包括科教文卫)	中国侨务政策的报道				
					关于侨区开展土改	关于保护侨汇政策	关于安置归侨、侨乡建设	关于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关于华侨回国观光团
1950	188	23	47	90	2	3	17	4	2
1951	219	7	59	95	6	7	29	6	10
1952	226	10	50	93	8	8	31	5	21
1953	217	9	49	91	5	7	33	6	17
1954	224	15	41	97	4	5	30	9	23
1955	209	13	43	90	2	6	32	5	18
1956	225	10	42	97	1	8	31	11	25
合计	1508	87	331	653	28	44	203	46	116
百分比	100%	6%	22%	43%	2	3	13	3	7
					2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1950-1956年所抽取的《生活报》整理制作。

据报道,1952年7-11月缅甸、印尼、印度等国的闽籍华侨回国参观团在东北、华北、华中与华南参观工厂、农场、机关、学校后,目睹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纷纷寄

^① 《生活报》创办于1945年10月,是印尼爱国华侨的喉舌,拥护新中国政府。由黄周规担任董事长兼社长,王纪元任副社长兼主笔,总编辑张又君,董事会成员主要有杨新容、汪大均、翁福林、叶景宗、陈道三等人。《生活报》在20世纪50年代是印尼华社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报之一,其日报的发行量曾达到5万多份。1965年该报被印尼军政当局取缔。社长黄周规先生将整套报纸带回北京,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2013年10月,为纪念《生活报》创办68周年,印尼归侨有识之士联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了“纪念印尼《生活报》创办68周年暨《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首发研讨会”。有关《生活报》的历史,参看千仞、梁俊祥主编《生活报的回忆》,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观感文字给华侨报纸发表,或者接见华侨记者畅叙此行印象,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向居住国侨社与当地社会传播,成为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肇始。如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团团长宋中铨先生在雅加达颇有影响的华文报纸《新报》撰文,颂扬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称赞“祖国太可爱”。^[25]一位印尼华侨妇女代表在对《新报》记者畅谈回国观感时说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同胞空前团结,大家都以无比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而献出能献出的力量。治安秩序也再好没有了,处处盗匪肃清;乞丐、流氓都收容到政府特设的学习所中受改造教育;小偷、扒手绝迹;路不拾遗;社会上呈现了风俗淳朴和高度安宁的气象。”^[26]而观光团的另一位叫汤新娘的印尼籍土生华人,更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新气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新娘女士自小接受荷兰文教育,在荷兰莱顿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在印尼行医,曾一度被选为雅加达市议会议员,并担任印尼中华民主党委员,是一位在印尼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华人精英。但她没有接受过中文教育,对中国的情况也茫然无知,在到中国观光之前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充满了猜疑。但在观光结束后回到印尼,在接受华侨记者的采访时,激动地说“我带着疑问而去,带着信心归来。我坚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祖国将继续迅速进步下去,我祈祷毛主席长寿延龄,无灾无病!”^[27]正是通过这些华侨回国观光,新中国的崭新形象,新中国领导人的人格魅力,由于华侨华人的宣传而被印尼华侨华人社会认同与拥护,这对争取侨心,凝聚侨力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推动了新中国大批华侨华人回国省亲、升学、就业、投资与居住,据报道,新中国成立10年间,就安置了三十多万归国华侨,^①其中无疑包含大量受到观光团报道宣传影响而选择回国的华侨华人。

结 语

华侨回国观光团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侨务外交政策指导下的重要活动,是在国共对峙、国际冷战背景下新中国争取海外华侨华人了解、认同、支持的重要方式。侨乡作为联系海外华侨与中国的重要纽带,在华侨回国观光团活动中有重要作用,通过各级政府精心安排与组织的欢迎接待、参观访问以及政治宣传,海外华侨加深了对新中国与侨乡的了解,同时,新中国的建设与侨乡发展变化对激发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引导华侨对新中国的认同与支持、促进华侨与侨乡的联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侨乡是华侨观光团参观活动的重要内容,华侨对家乡有深厚感情,他们对侨乡发展变化除了赞扬外,对侨乡的土改政策、工商业政策、干部作风、生活水平较低、社会陋习等也产生了许多不满、疑虑、担心,甚至恐惧。但是由于华侨回国观光团活动的政治性质与海外影响,因此在宣传过程中多强调以正面、积极报道为主,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了海外华侨对侨乡及新中国的全面、客观认识。5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极左政治思潮高涨与极左政治运动的全面开展,侨乡与海外华侨也被卷入中国政治的漩涡,侨乡的海外关系成为极左政治斗争的靶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极大地破坏了海外华侨对新中国的好感与认同,建国初期侨务外交的战略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弱化,华侨回国观光团活动在经历了50年代的繁荣后,在60年代中期逐渐减少放缓,直到停止。

注释:

[1]《何香凝告国外同胞书》,《大公报》(香港)1956年10月2日,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剪报《侨务政策法规》,编号:1-2-68。

[2]庄希泉《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当前的基本任务》,《侨务报》1956年10月创刊号。

① 参看《廖承志元旦广播词》,《侨务报》1960年第1期。

- [3]《照耀着华侨的光辉》,《侨务报》1956年10月创刊号。
- [4]中侨委《关于正确处理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的“海外关系”问题的请示报告》,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2-1225-0001。
- [5]中侨委《关于今后加强侨务宣传工作的报告》,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04-3-299-045-051。
- [6]《侨务报》1956年10月创刊号。
- [7][22]1954年9月25日《招待华侨回国观光工作计划》,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35-115-077-082。
- [8][9][10]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1956年第二季度关于华侨回国观光团接待工作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1-0086-0046。
- [9]《1956年接待华侨回国观光团的工作规划》,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1-0086-0095。
- [10]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1956年国庆节华侨及港澳同胞回国观光团接待工作几点决定及1956年招待观光团开支标准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2-0717-0011。
- [11]《南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华侨回国观光情况》,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3-2064-0015。
-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四年来侨务工作总结和一九六二年工作任务》,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230-003-0662-0119。
- [13]《华侨今年回国观光,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多》,《大公报》(香港)1957年4月4日,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剪报资料合辑本《华侨回国观光团》,登记号0702。
- [14][18]新会县政府网站 <http://www.xinhui.gov.cn/export/xhsz/sz/sz08-5.htm>。
- [15]《1953年度接待华侨回国观光团情况报告》,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2-0472-0025。
- [16]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1956年第二季度关于华侨回国观光团接待工作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1-0086-0046。
- [17][21]中共福建省晋江地委统一战线工作部《1956年国庆华侨回国(港澳)观光团、新、马工商业贸易考察团接待工作总结》,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2-0658-0001。
- [19]《1953年度接待华侨回国观光团情况报告》,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2-0472-0025。
- [20]《一位华侨观光团员的意见》,《侨务报》1956年第3期。
- [23]《函请准备接待越南华侨回国观光团》,福建省档案馆,0148-002-0607-0150。
- [24]《关于接待越南华侨观光团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函请准备接待越南华侨回国观光团》,0148-002-0607-0150,福建省档案馆。
- [25][26][27]《厦门侨联》1952年刊,第16、17、18页。

[责任编辑:李 华]

HuaQiao Sightseeing Program and Beijing's Diaspora Diplomacy in 1950s

SHI Xue-qin WANG Liu-b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Qiao Xiang archives, attempts to study the Chinese Diaspora's role in PRC's diplomatic strategy by studying *HuaQiao Sightseeing Program* mobilized and organiz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The paper examines and analyzes the motive, procedure,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 of government's dominated Sightseeing Programs, pointing out that Chinese Diaspor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engagement with overseas world and functioned as an active actor in China's diplomacy in 1950s. Through the *Huaqiao Sightseeing Program* and overseas propaganda strategy, China expande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consolidated its legitimacy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competition with Taiwan's efforts to earn Chinese Diasporas' support.

Key words: *Huaqiao Sightseeing Program*, China's diaspora diplomacy, Qiao Xiang